

唐宋八大家

■ 李德哲 主编

第三卷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宋八大家/李德哲主编,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5601-4243-2

I. 唐… II. 李… III. ①唐宋八大家—古典散文—选集

②唐宋八大家—古典诗歌—选集 IV. 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1470 号

书 名: 唐宋八大家

作 者: 李德哲 主编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 黄凤新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10×1030 毫米 1/16

印张: 51.5 字数: 746 千字

ISBN 978-7-5601-4243-2

封面设计: 赵云峰 世纪鼎

北京华戈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2009 年 4 月 第 1 版

2009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

定价: 27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8499826

网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编 委 会

主	编：	李德哲			
编	委：	齐豫生	夏于全	张 桦	刘志红
		朱立春	李 萌	杨 波	孙承飞
		李维杰	李喜彪	丁 文	乔赫水
		倪 文	吕致文	曲洪琪	唐景安
		任 珂	莫关亮	翟国斌	刘天桦
		江小帆	郭 超	江 一	程 武
		谭 波	常志冈	钟力辉	罗 琳
		刘 琪	尹 农	陆 冰	王 新
		姚继志	董嘉坚	王 军	牛 立
		许向华	陈迎冰		
排	版：	徐 杰	张红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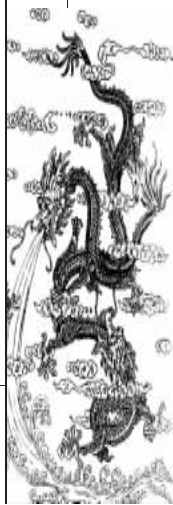
前言

近五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华夏文明中,文章妙手如群星闪烁,不可胜计。当现代人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唐宋文坛风云际会的历史瞬间时,多数人会眩惑于诗与词灿烂的云霓,却往往忽略了掩于其后的另外一种同样重要的文学体裁——散文。

唐宋散文,上承先秦汉魏六朝,下启元明清三代,是我国散文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其时名家辈出,各具个性,文体大备,丰富多彩,既大大拓展了散文的天地,又多有传世名作,可谓盛况空前,震古烁今。其中作家最负盛名者有八位,他们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被后人尊称为“唐宋八大家”。

唐宋八大家由于各自所接受的传统文化影响不同,所面临的社会历史背景不同,以及自身的际遇不同,其文章所涉及之领域与内容亦不尽相同。韩愈以振废起衰为己任,其文多涉及“道统”之类,追往圣,继绝学,为复古张目,回击阻碍古文运动发展的种种言论。柳、欧、王等都是全力从事政治革新的人,身处政治革新运动的漩涡,所以他们的文章更多涉及当时的政治焦点及社会现实,既有对下民病痛的忧心,也有对贤才湮没的同情;既有对奸吏暴政的抨击,也有对衰风弊习的斥讽。其笔触所及,远比六朝骈文更为广阔、丰富。而“三苏”更以学识渊博著称于世,其文立足现实问题,出入于经史及诸子百家,旁征博引、气势磅礴,多史论之作,为社会改良开济药方,摇旗呐喊。曾巩一生官位既不如欧阳修、王安石之显赫,仕途亦不如柳宗元、苏轼之多坎坷,其文多阐述古文理论、劝诫后学上进之作。

更值得注意的是,唐宋八大家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都铸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如韩愈之构思精巧,气盛言宜;柳宗元之思理深邃,牢笼百态;欧阳修之唱叹多情,从容不迫,无艰难劳苦之态;王安石之锋利劲峭,绝少枝叶;曾巩之醇朴平实,深切往复;苏洵之纵横雄奇,尤长策论;苏轼之如行云流水,随物赋形,宛转曲折,各尽其妙;苏辙之委曲明畅,一波三折等。应该说,这表明了唐宋诸家在“文学的自觉”、艺术的追求上,比缺乏艺术个性的六朝人要更向前跨进了一步。同



唐宋八大家

时,诸大家在散文理论的构建中,虽力反六朝颓风,对其文笔之辨、文学特质的探讨亦弃之不顾,而在创作实践中却并未忽视散文抒情的特质。他们在创作中摆脱了音律、辞藻等方面的重重束缚,在熔冶古人与时人语言的基础上,吸取各方面有益的艺术技巧,从而创造出随势而异、新颖完美的散文艺术形式。这种继承与发展的特质在今天仍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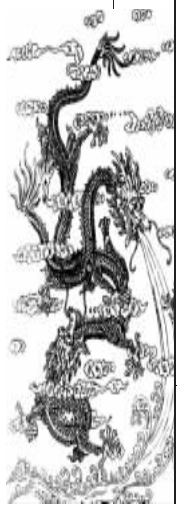
当然,唐宋散文作者堪称大家者,远不止上述诸人,其他如晚唐小品文作家罗隐、皮日休、陆龟蒙,以及北宋的范仲淹、司马光等,都颇具大家风范。但在散文理论的构建、推广及对后学的影响上,上述诸大家却为举世所公认的丰碑。此八大家之作,大抵代表了唐宋散文的最高成就。于是,我们将其辑录编译,详加校勘,名曰《唐宋八大家》以飨广大读者,希望能有助于读者管中窥豹,触类旁通,了解唐宋散文的价值,并从这笔宝贵的遗产中汲取滋养,或可作为繁荣今天散文创作的借鉴。

诸大家除散文创作取得很高成就外,诗词方面亦有可观之作,韩柳的诗,欧阳修、苏轼的词,均当之无愧地属大家行列。本书在重点突出八大家散文创作成就时,对韩愈、柳宗元的诗,欧阳修、苏轼、苏辙、王安石的词也一并铺陈,进一步张扬其大家气象,以彰其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所做出的继往开来的重要贡献。

当然,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时间仓猝,书中恐怕难免有贻误不当之处。恳请广大读者和文史界同仁批评指正,以便让我们再版时及时修正。

编 者

2009 年 4 月



曾 巩

(1019—1083),字子固,宋建昌南丰(今江西南丰县)人,人称南丰先生。12岁写文章,嘉祐二年(1057年)中进士,曾长期编校史馆书籍和担任知州。官至中书舍人。曾巩笃于友爱,其父亡后,他对四弟九妹的教养尽心尽力,在古代传为佳话。做地方官员时,体恤民情,政绩卓然。一生以文学名世,《宋史》称其文章“上下驰骤,愈出而愈工,本愿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著有《元丰类稿》、《隆平集》。

寄欧阳舍人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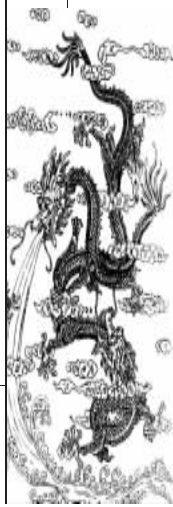
曾巩是欧阳修的学生,欧阳修为其逝去的祖父写了一篇墓碑铭,曾巩为此写了此信表示感谢。信中开篇强调:“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墓志铭与墓碑铭对于死者意义重大,不能等闲视之,“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但流传下来的很少,原因在于世人没有真正意识到铭志的意义所在,“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因而要写出一篇百世流传的铭志,“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如今欧阳修的道德文章堪称数百年难得一遇,能亲自为自己的祖父撰写铭文,对自己来说确实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全文缘情设语,发自肺腑毫无半点做作之嫌,感激之情真而不媚。

【原文】

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

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当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



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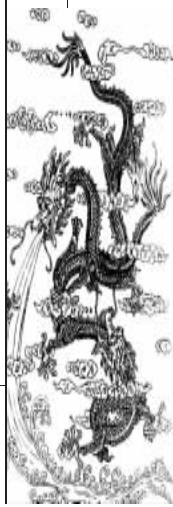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喟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挹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

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愧甚，不宣。

【译文】

去年秋天有人归来，带给我您赐予的一封信以及您为先祖父所撰写的一篇墓碑铭。我反复阅读，感激和惭愧的心情禁不住交织在一起。

铭志这类文章在世上长存，意义跟史书相近，但也有与史书不同的地方。这是因为史书对一个人的好坏没有不写上去的，而铭志却是因为古代的人在功业、道德、才能、行为、理想和气节等方面有突出表现，恐怕后代人不知道，就决定用铭志的方式来加以显扬。有的安放在祠堂，有的安放在坟墓，用意都是一样的。如果这个人是坏人，那么铭上能记载什么呢？这就是它跟史书不同的地方。写铭志文章，是为了让死的人没有什么遗憾，活的人能够表达他们的敬意。好人愿意被后代人传颂，那么就会勇于使自己成为人们学习的模范；坏人感到没有什么可以记载下来的功绩，就会因此既惭愧，又惧怕。至于渊博的学识，高明的见识，正义的业绩，节烈的事迹，美好的言论，善良的行



为,全部在铭志文章中显示出来,就能够使后代人效法。警恶劝善的道理,不跟史书相近,那会跟什么相近呢?

等到社会风气败坏时,作为子孙的,都想要褒扬他们死去的尊长,却不在乎他们原先的情况。所以,就是坏人,他的子孙也一定要给他树碑刻铭,向后代人夸耀。那些写铭志文章的人,既不能拒绝他们,又因为是死者子孙的请求,写死者的坏事吧,那么在人情上就通不过,这样,铭志文章的内容开始不真实了。后代写铭志的人,还要看其是什么样的人。假如委托给一个不合适的人,那么他写的铭志就不会公正和真实,也就不能够在当代流传,在后代传诵。所以千百年来,从大小官员到普通百姓,几乎没有人没有铭志,可是传下来的却很少,那缘故不是别的,而是委托的人是不合适的,因而写的铭志就不可能公正和真实。

既然如此,那么谁是那种适合的人,写的铭志能够完全达到公正和真实呢?不是具备很高的道德修养和善于写文章的人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因为具有很高的道德修养的人,对于坏人,就不接受其委托去写铭志;对于一般人,也可以辨别他的好坏。人的表现,有心地好而事迹不好的;有内心奸邪而外表善良的;有好坏相差极远却不能够具体指出的;有实际比名气大的,也有名气比实际大的。如同用人才那样,不是具备很高道德修养的人,怎么能够在区分他们时不被蒙蔽,在评议他们时不徇私情?假使不被蒙蔽,不徇私情,那就能够做到公正而且真实了。但是假如他的文章写得不好,那么世上也不会流传,因此,问题就在于他的文章和道德是否同样好了。所以说具备很高的道德修养而又善于写文章的人是能够做到的,难道不是如此吗?

然而,具备很高的道德修养而又善于写文章的人,虽然当代可能就有,但也可能隔几十年才有,也可能隔一二百年才有这样的人。铭志的流传本就困难,能写铭志的人要碰上这样的人又是这样的困难。先生的道德文章,当然是上面所说的要隔几百年才有的了。先祖父的言与行是卓越的,幸亏碰到您,才能够写得如此公正和真实,这篇铭文在当代传诵、传于后代,是毫无疑问的了。社会上的读书人,每次观看传记中写的古人事迹,特别是那些值得感动的地方,就往往悲痛得不觉落泪,何况是他们的子孙呢?更不用说是我了。追慕自己祖先的德行,考虑它所以流传的根由,就知道先生以此赐给我,实际上是使我家祖孙三代都蒙受恩德,我感激和报答的心情应当怎样来实现呢?不过,又想到像我这样学识浅薄,资质笨拙的人,先生却勉励有加;先祖父的处境艰难,屡遭挫折,郁郁不得志直到逝世,先生却赞扬他,那么,



社会上那些有伟大理想、杰出抱负的不常碰到的读书人，谁不愿意进您的门下？避世隐居的读书人，谁不对前途抱有很大希望？好人谁不希望做？坏人谁不感到既惭愧又惧怕？做父亲、祖父的人，哪一个不想教育好自己的儿子、孙子？做儿子、孙子的人，哪一个不想使自己的父亲、祖父荣耀？这几桩好事，应该完全归功于先生。

既拜领了您的赐予，再向您陈述我所以这样感激的原因。来信中所说关于我家族系统的次序，我会恭敬地接受您的教诲再作一次详细的增补。很惭愧，我的心意不能在信里全部表达出来。

赠黎安二生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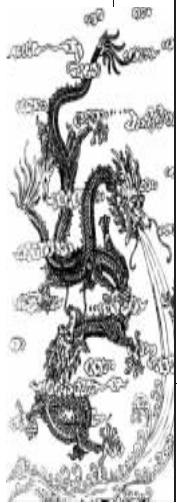
曾巩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理论家和创作家。黎生和安生是苏轼向曾巩推荐的两位年轻人，他们也爱好古文。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临行前请作者作文，并以此去驳斥那些嘲笑古文的乡里俗人。作者在文中以自嘲的口吻对那些嘲笑古文的态度作了有力的回答，劝告二生不要“合乎世”，“同乎俗”，要“信乎古”，“志乎道”，应该坚定自己对文学改革的态度，把诗文革新运动进行到底。文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文学改革运动中革新派与守旧派的激烈斗争。

【原文】

赵郡苏轼，予之同年友也。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予，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予。读其文，诚闳壮隽伟，善反复驰骋，穷尽事理，而其才力之放纵，若不可极者也。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

顷之，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将行，请予言以为赠。予曰：“予之知生，既得之于心矣，乃将以言相求于外邪？”黎生曰：“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今求子之言，盖将解惑于里人。”

予闻之，自顾而笑。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若予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然则若予之于生，将何言哉？谓予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



【译文】

赵郡苏轼是我的同年好友。他把信从四川寄到京城给我，称赞四川的两位年轻书生黎生和安生。过了不久，黎生带了他的几十万字的文章，安生也带了他的几千字的文章，到我这里来。我读了他们的文章，觉得内容确实宏大，意味深远，文意纵横驰骋，事理透彻；他们的才华又是那样的出众，似乎不能看到它的尽头。二生固然可以说是奇特杰出的人才，苏君当然也可以说是善于识人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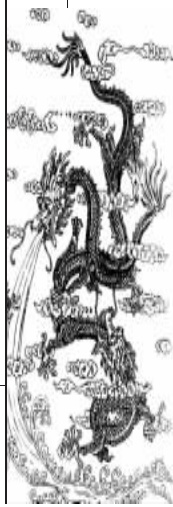
不久，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的缺，快要上任时，要求我以言相赠。我说：“我了解你，而且已经在内心深处留下你的印象了，你需要在形式上让我用言语加以表示吗？”黎生说：“我和安生学习这种古文，同乡的人都笑话我们，认为我们脱离现实。现在请您写的这篇文章，是打算给同乡人看的，以解除他们的迷惑。”

我听了他的话，想想自己，不觉好笑起来。世上不合时宜的人，有哪一个比得上我呢？只知道相信古人的话，却不知道同当代的风气迎合一致；只知对圣贤之道立志钻研，却不知同世俗一致。这就是我现在还穷困的原因，而且自己还没有觉醒啊。比一比世上不合时宜的人，有哪一个能超过我呢？如今，你的不合时宜，仅仅是因为写出来的文章跟世俗崇尚的文体不相符合，是不合时宜的小问题，只是担心被同乡的人讥笑。像我的不合时宜可就大了，如果你拿着我的文章回去，将会使你的过错加重，就不仅仅是被讥笑了。既然如此，那么像我这样的人面对你，应该说什么呢？说我的不合时宜是对的吧，那么它的后患就是这样。说不对吧，那么就与现时的风气迎合了，而对于古人的话就必定违背；对于世俗的风尚有所相同，对于圣贤之道必定就远离了。希望你不要急于消除同乡人的迷惑，这样，就一定能够经过选择获得正确的认识。于是，我写下这几句话把它送给二生，并且打算给苏君看看，不知道苏君认为我的话怎样。

太祖皇帝总序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急速衰败，后期藩镇割据愈演愈烈，直接导致五代十国混乱局面的产生。

赵匡胤自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朝，先后灭亡各割据势力，实现了天下统一。为了巩固统治，赵匡胤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以文臣知州事，削藩镇兵权；绳赃吏重法，以绝祸乱之源；务农兴学，慎刑薄敛，与百姓休息。



曾巩上的这篇太祖总序，述论了赵匡胤继五代残局之后，建国立业，恢复强化封建政权的种种措施。并将宋太祖与汉高祖作比，认为汉高祖“十不及”于宋太祖，极力赞颂了宋太祖的丰功伟绩。

【原文】

盖唐之敝，自天宝已后，纪纲寢坏，不能自振，以至于失天下。五代兴起，五十余年之间，更八姓十有四君，危亡之变数矣。其尤甚也，契丹遂入中国，擅立名号。当是时，天地五行人事之理反易繆乱，不同夷狄者亡几耳。

太祖为天下所戴，践尊位，以生民为任，故劝农桑，薄赋敛，缓刑罚，除旧政之不便民者，诏令勉核相属，推其心，无一日不在百姓也。知方镇之病民也，故设通判之员，使敛以绳墨。忧吏之不良也，故数使在位举其所知。患吏或受赇，或不奉法也，故罪至死徙，一无所贷。原其意，盖以谓遭世大衰，不如是，吏不知禁，不能救民于焚溺之中也。征伐既下诸国，必先已逋欠，涤烦苛，赈乏绝，雪冤滞，惠农民，拔人才，申命郡邑，反复不倦。或遇水旱，辄蔬食请祷，欲移灾于己。其于群臣，有恩旧，有劳能，待之各尽其分，以位贵之，以财富之，有男使尚主，有女使嫁宗室，其予人之周也如此。即材可用，虽仇不废；不可用，虽光显矣，不处以势。其有罪多纵贷之，或赐之使自愧。及至坚明约束以整齐天下者，亦使之不能逾也。

强僭之国，皆接以恩礼。商贾往来不禁，有出境犯其令者，乃为之置市边邑，使两利。有所乏少，常赈助之。征伐所加，必其罪暴著，师出未尝不以义也。其君长已降，及就俘执，道路劳问迎致，使者相望。既至，罪不数辱之，优假秩禄，及其宗亲吏属，赐以田宅，使子孙世守，拥护保全，皆得以寿考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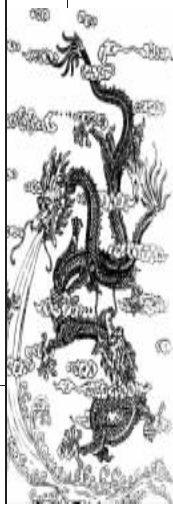
自晋既覆灭，契丹寢大，中国惴畏不敢当。太祖拔用材武护西北边，宠以非常之恩，任属专，听信明。常遣戍卒，戒之曰：“我犹赦汝，郭进杀汝矣。”有讼进者，谓曰：“进军政严，此必犯进法。”送进，使杀之。关市租赋，诸将得恣用，不问出入。以其故，士附，斗者尽力，谍者尽情，边臣可谗者，皆十馀年不易其任。然位不过巡检使，众不过三五百人。盖任专则势便，位不极则士励，兵少则用约，御将亦多术矣。总其所长，能兼用之，故能省费息民，振新集之众，屈凭陵之寇也。

盖太祖笃于孝友，有天下之行；聪明智勇，有天下之材；仁心爱人，有天下之志；包含遍覆，有天下之量。守之以勤俭恭慎，虚心纳谏。鉴于粤、蜀，以奢侈为戒。思天下之重，不复游畋。封拜诸子，务自约损，不尽循故典。收纳学士大夫，用之不求其备，或守难进之节，亦不夺

也。晚喜读书，劝诸将以学，曰：“欲使之知治道也。”兼覆夷夏，从容以德。江南平，览捷书而泣曰：“师征不义，而顾令吾民死兵，彼何负哉！”秦州已入，尚波于之地，却而不受。钱俶来朝，复归之越。契丹愿听盟约，逡巡退抑，不自矜伐。天下大势，连数十城之镇，割其故地，以小其力；易动难畜之兵，敛置怀服，以消其难。至于举贤良，崇孝弟，缀礼乐，明考课，虽宇内初辑，然庶政大体，弥纶备具；遗文故事，施于后世，皆可为法。民于是时，从死更生，室家相保；士农工贾，各还其职；鸟兽草木，亦莫不遂。前世旧臣，备将相、处腹心爪牙之任者，一旦回心，奉令北向，如素委质。天下广都通邑，兼地千里，德怀二三之臣，负众自用，令之不从、召之不至者，尚数十，皆束衽来庭，代易奔走，如水湊下。粤、蜀、吴、楚、瓯、闽之君，分天下为八九，曰帝与王，传子及孙，更数十岁者，编名囚虏，并聚阙下。四海之内，混齐为一。海东之国高丽，极南交趾，西戎吐蕃、回纥，北狄契丹，皆请吏奉贡。天地所养，通途之属，莫不内附。当是时，更立天下，与民为始，天地五行人事之理，乱而复正。盖太祖之于受命，非如前世之君，图众以智，图柄以力，其处心积虑，非一夕一日，在于取天下也。其在天者历数，在人者群臣万民，三军之士不归周，归太祖，未有知其所以然者，所谓天也。及其传天下也，舍子属弟。是则太祖之受天下，与舜受之尧，禹受之舜，其揆一也。其传天下，与尧传之舜，舜传之禹，其揆一也。受天下及传天下，视天与人而已，非其心未尝有天下，岂能如是哉！

世以太祖为不世出之主，与汉高祖同。盖太祖为人有大度，意豁如也，知人善任使，与汉高祖同，固然也。太祖承自天宝以后，更五代二百余年极敝之天下；汉祖承全盛之秦，二世之末，天下始乱，所因之势既殊。太祖开建帝业，作则垂宪，后常可行；汉祖初定海内而已，不及一。太祖立折杖法，脱民榜笞死祸，定著常刑，一本宽大；汉祖虽约法三章，然肉刑三族之诛，至孝文始去，不及二。太祖功臣，皆故等夷，及位定，上下相安，始终一意；汉祖疑间诸将，夷灭其家，不及三。太祖削大弱强，藩臣遵职；汉祖封国过制，反者更起，累世乃定，不及四。太祖征伐必克；汉祖数战辄北，不及五。太祖文武自出，群臣莫及；汉祖非得三杰之助，不得无失，不及六。开宝之初，南海先下；赵陀分越而帝，汉祖不能禁，不及七。太祖不用兵革，契丹自附；汉祖折厄白登，身仅免祸，不及八。太祖后宫二百，问愿归者，复去四之一；汉祖溺于衽席，女祸及宗，不及九。太祖明于大计，以属天下；汉祖择嗣不审，几坠厥世，不及十也。汉祖所不能及，其大者如此。

是自三代以来，拨乱之主，未有及太祖也。三代盛矣，然禹之孙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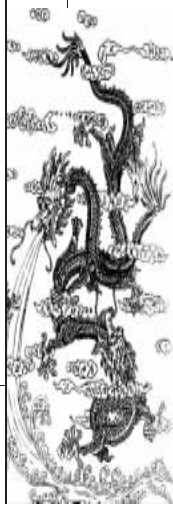


康失国，汤之孙太甲放废。文武之后世三四传，昭王不返于楚。由汉以下，变故之密，盖不可胜道也。太祖经始大基，流风馥泽，所被者远。五圣遵业，至今百有二十余年。上下和乐，无变容动色之虑，接于耳目，治安久长，自三代以来所未有也。维太祖创始传后，比迹尧舜，纲理天下，轶于汉祖；太平之业，施于无穷，三代所不及。成功盛德，其至矣哉！盖唐天宝十四年，天下户八百九十一万。太祖元年，户九十六万；末年，天下既定，户三百九万。今上元丰二年，户一千三百九十一万。六圣之德泽，覆露生养，斯其所以盛也。本原事实，其所由致此，有自也哉。

【译文】

总的讲来，唐朝的衰败，是从玄宗天宝以后，朝廷纲纪开始逐渐被破坏，没办法再自我振兴，直至丧失天下的。五代继唐兴起，整整五十多年间，更换了八个姓氏的中原王朝和十四位君主，危亡的交替真是太频繁了。其中最严重的，是契丹直接进入中原，擅自定立中原皇帝的名位和称号。这段时期，天地和木火土金水的五行顺序以及人间事体的原有规律简直颠倒过来，荒谬错乱了，中原和少数部族不同的地方，已经为数不多了。

太祖被天下所拥戴，登上帝位，把拯救百姓作为自己的责任，所以鼓励农业生产，减轻赋税，轻用刑罚，废除过去朝政对百姓不合适的地方。下达诏令予以劝勉、验核，一道接着一道。推究太祖的用心，全都在百姓的身上啊！太祖深知各地方军事长官给百姓带来的祸害，所以设立通判的职位，使通判靠法规约束他们。又担心官吏不贤良，所以又多次责成在位的官员荐举本人所了解的人才。忧虑官员有的接受贿赂，某些不奉守法令，所以对官员定罪，直至定到死刑和流放，一个也不宽恕轻饶。细想太祖的本意，或许是认为遭遇社会大衰乱，如果不如此，官吏就不知道法禁，也就不能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征伐各个独立的政权取胜以后，必定会首先免除当地百姓拖欠的赋税，废除各项严酷的刑法，赈济穷困的人，昭雪积压的冤案，让农民得到实惠，选拔人才，命令川郡办好事，反反复复，孜孜不倦。有时遇到水旱灾害，就用粗食淡饭，对上天祷告，希望把灾祸转降到自己身上。太祖对于众臣僚，有的属于老部下，有的属于吃苦耐劳的人，对待他们都恰到好处，用官位让他们显贵起来，赐予钱财让他们豪富起来。有儿子的，就让他儿子匹配公主；有女儿的，就让他女儿嫁给宗室。太祖赐给别人的，竟然周全到如此地步。如果是贤才确实可以任用，即便是仇人也不废弃他；如果不可任用，尽管让他光耀显贵了，却不授



给他重要职位。他们犯下罪过，大多予以宽容赦免，或对他们再进行赏赐，让他们内心感到惭愧。至于在决心宣明约束来使天下全都遵守的问题上，也让这些臣僚不能够随意超越。

对于那些割据称号的国家，也全都用恩惠赏赐来相待。商贾往来不加禁止，有越出所在国境而触犯本国法令的，就替他们在边境城镇设立交易的场所，使双方都有利。哪个国家出现了贫乏的情况，就时常帮助它们。征伐所指向的对象，一定是他罪恶昭著，出兵从未不按照道义来决定。对方君主已经归降或被生擒活捉，在道路上予以慰劳问候，迎接招待，派出的使者接连不断。来到京师以后，对他们的罪过不再列举用以侮辱他们。而是给他们很高的官位和优厚的俸禄，并且连带到他们的亲属和下属官员，赐给土地和房子，让他们子子孙孙代代享用。对这些君主照顾保护，使他们全都得以享尽天年才去世。

自从后晋灭亡以后，契丹逐渐强大，中原地区害怕畏惧，无法抗衡。太祖选拔任用军事人才守卫西北边境，用超出常规的恩礼重用他们，专一嘱托信用，听取告发的言语时，也分辨得明明白白。曾经派遣戍卒到边境，告诫他们说：“我还算能赦免你们，可郭进却要斩杀你们了。”某人控告郭进，太祖对人说：“郭进的军令非常严厉，这个人一定是触犯了军法。”于是把他交给郭进，郭进斩了他。边关贸易的税收和租赋，众将可以随意使用，根本不查问收支的情况，出于这个原因，兵士都归附将领，参加战斗的人都拼死出力，负责刺探敌情的人都能得到全部的敌情。边区臣僚可以委托的，全都是十多年不调换他们的职务，然而官位也不会超过巡检使，手下军队也超不过三五千人。主要原因是委任专一处理灵活，官位不到最高品级就会自励，军队人数少就调遣简单。驾驭将领的方法是各式各样的了，综合这些方法的好处，能够各方面都加以运用，所以能够节省军费，使民心安定，振作起新汇聚成的部队，挫败进犯的敌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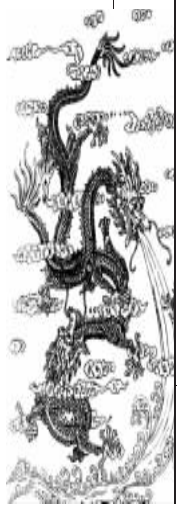
总的说来，太祖对孝顺和友爱特别真诚，具有天下人加在一起的德行；聪明、机智、勇猛，具有天下人合起来的才能；用仁慈之心爱护百姓，具有天下人加在一起的志向；无不涵容，具有天下人加在一起的度量。靠勤俭恭敬和慎重来作守持，虚心采纳劝谏的话语。从南汉、后蜀吸取经验，把奢侈作为鉴戒。考虑治理天下的大事，不再游赏和打猎。封拜自己的儿子，务必自行降低官爵级别，不完全沿用从前的制度。接纳学者和士大夫，使用他们不求全责备，有人持守不愿做官的节操，不会勉强他。晚年喜欢读书，并勉励众将学习，说：“这样做是为了让他们了解治国的原则与方法。”同时感化中原和周边地区，通过仁



德从容处理。平定南唐后，观览报捷书竟落泪说：“出兵讨伐不义的国家，可反过来又让我大宋百姓死在战场上，他们有什么罪过呢？”秦州已经收复，可西夏首领尚波于的领地，却退还给他。吴越国主钱俶前来朝拜，又让他返回吴越。契丹愿意订立盟约，太祖随后立刻撤兵，不炫耀自身武力。而那些势力强大、数十城连成一片的藩镇，分割他们的原来辖区，使他们的力量减弱。那些容易反叛、很难管辖的部队，收聚屯置，让他们从内心归服，以便消除他们可能造成的祸难。至于提拔有才能的人，推崇孝顺友爱的人，重建礼乐制度，确立考核官员的办法，尽管天下刚刚安定，然而各种政务和基本原则，都筹划安排得合理详细了。这些遗留下来的典章和惯例，运用到后世，都可以成为规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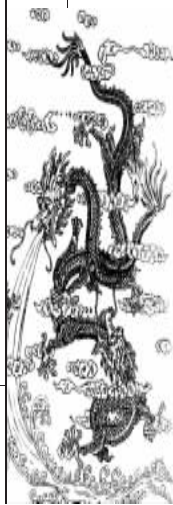
老百姓在这一时期，从死亡中获得新生，家庭都幸福安定。读书人、耕田人、手艺人、和买卖人，各自回归到自身的本业。鸟兽草木，也都正常生长。前代各个国家的臣僚，身居将帅宰相，担任同君主关系最亲近的职位的人，一旦回心转意，接受大宋命令，归顺投降，还可以像从前那样为国效力。占据天下名城重镇、辖有地盘上千里而又心存他念的人，依仗众兵自行其是。拒不服从命令、征召而不前来的人，还有几十个，全都整理好衣服前来朝见，愿意代替天子奔走效劳，就像水在低处汇聚似的；南汉、后蜀、吴越、荆南、福建的君主，把天下割裂成八九块，称帝称王，传给儿子又传给后代，历经几十年的，都被编入了囚徒俘虏的花名册，一起聚集到天子脚下。天下范围内，形成统一的局面。大海东部的高丽国，最南端的交趾，西部的吐蕃部族、回纥部族，北部的契丹部族，全都俯首称臣，进献贡品。天地所生养和大路所通向的各处人民，全都归附了。在这一时期，重新定立天下，与百姓再度从头开始，天地和木火土金水五行的顺序以及人间万物的固有道理，错乱而又恢复正常了。这是由于太祖承受天命，并不像前代的君主，用智诈来愚弄下面的人，用暴力来谋取帝位。太祖处心积虑，并不是只考虑一朝一夕，目的在于取得整个天下。由上天决定的是那定数，由人决定的是那群臣万民。三军众将士不归附后周，却归向太祖，这里面还没有谁清楚原因，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天意。等到太祖传付天下，舍弃亲生的儿子，却交给自己的弟弟。这就说明，太祖承受天下，就和舜从尧那里、大禹从舜那里接替帝位一样。太祖传付天下，就和尧传帝位给舜，舜传帝位给大禹一样，承受天下和传付天下，随上天和世人变化罢了。如果不是太祖心中有天下，又哪里能够像这样呢？

世上认为太祖是好多年才会出现的明主，与汉高祖相同。这是因为太祖为人具有恢宏的气度，意气特别地豁达，能善解人意又善于任



用驱使，与汉高祖相同，这些原本是一样的。但太祖承接的是天宝以后、历经五代二百多年战乱之后极其破败的天下，而汉高祖承接在极盛的秦朝、秦二世的末年，这时天下刚刚出现动乱。二人承接的形势虽然不同，而太祖开创建立帝业，树立法则，垂示准绳，后世永久可以奉行，汉高祖不过初步平定海内而已，这是他不及太祖的第一点。太祖制定折杖法，使百姓从被鞭撻抽打不免死去的灾难中解脱出来，确定常用的刑罚，也完全本着宽大的原则。而汉高祖尽管约法三章，但是肉刑和诛灭三族的酷刑到孝文帝时才废除，这是他不及太祖的第二点。太祖的功臣，都是过去的同僚，帝位稳定后，上下相安，由始至终一条心。而汉高祖猜疑离间各位将帅，灭绝他们的整个家族，这是他不及太祖的第三点。太祖削弱强大的藩镇，各地守臣都遵奉职守。而汉高祖封立诸侯王国，不遵守规则，反叛的事件接连出现，过了好几代才安定下来。这是他不及太祖的第四点。太祖征伐必定取胜，而汉高祖屡次作战，每战必败。这是他赶不上太祖的第五点。太祖文谋武略都自己想出来，群臣谁都无法达到。而汉高祖得不到萧何、张良、韩信的协助，就必定会出大错。这是他不及太祖的第六点。开宝初年，南汉最先被攻取下来。而西汉时赵陀占据南越称帝，汉高祖没办法阻止。这是他不及太祖的第七点。太祖不动用武力，契丹就自动归附。而汉高祖在白登遭受匈奴的围困，自身仅仅免于被擒。这是他不及太祖的第八点。太祖后宫只有二百人，询问她们当中愿意回家的，只保留四分之三。而汉高祖被枕边风吹得迷迷糊糊，吕后专权的祸害危及到刘氏政权。这是他不及太祖的第九点。太祖对帝位传授非常明白，把天下交给同胞弟弟。而汉高祖择选继位人不慎重，几乎丧失掉刘氏天下。这是他不及太祖的第十点。汉高祖赶不上太祖的地方，重要的就是以上讲的。

这表明，从夏、商、周三代以来，拨除祸乱的君主，无人能赶得上太祖的。三代确实很兴盛了，然而大禹的孙子太康丧失了统治权，商汤的孙子太甲被大臣驱逐废掉，周文王和周武王以后传了三代，周昭王从楚国就没有能够返回来。自西汉以下，突发事变的频繁，多得数不清。太祖经营筹划帝业的根基，遗留传布开的风气和泽惠，波及的范围都特别深远。五位大宋圣帝遵承帝业，至今已有一百二十多年了。上下和乐，没有让人听到焦虑的消息传过来，长治久安的局面，从三代以来是未曾出现过的。只因太祖刚刚创业，传给后世，追比尧舜，治理天下，超越汉高祖，太平的基业延续到世世代代，连三代也赶不上。成就的功业和盛大的仁德，真是极至了。唐朝天宝十四年，全国



户口共有八百九十一万。太祖建隆元年，户口仅九十六万；到开宝九年，天下已经太平，户口达到三百零九万。当今皇上元丰二年，户口已增至一千三百九十一万。六位大宋圣帝的仁德恩泽，像上天和雨露那样滋润民众，这是兴盛的原因所在啊！追溯推究这些事实，能够至此的原因，确实是有来由的呀！

《战国策》目录序

嘉祐五年至治平二年，曾巩入史馆，校勘了许多古籍，《战国策》即其中之一。凡经校书都要作篇“目录序”，包括作者、篇数，兼及撰写、流传与整编简况，着笔不多。曾巩向来认为“为文志在明道”，因而在序中最着力处，涉及书的内容得失，借题发挥，因文生义。

曾巩在本文中主张“法变道不变”的思想。

【原文】

刘向所定《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第十一篇者阙，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叙曰：

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臆、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曰：

